

温州宗教情况的调查与思考

凯 弟

温州的经济发展为人们瞩目，宗教在温州的影响也为人们惊叹。下面，是我在温州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和自己的一些想法。

温州主要有四种宗教：佛教、道教、基督教和天主教。据1985年人口普查，温州总人口为629万，现在，天主教徒约5万人，基督教徒30余万人，共约占人口的百分之六。而佛道教的信徒数难于统计。寺观教堂，除经政府批准开放的外，还有一定数量是群众自己集资修建起来的。

温州市宗教事务局曾把温州的宗教情况概括为历史悠久，基础深厚，教徒众多，情况复杂。但是，从宗教与社会主义建设相协调以及不协调的角度看：

首先，存在着趋于协调的一面。就基督教来说，目前，这个教的教牧人员和信教群众的大多数拥护中国基督教自治、自养、自传的方针，他们使用中国基督教协会印发的《圣经》、《赞美诗》、《天风》等宗教书刊。从1982年到现在，全市出售《圣经》、《赞美诗》各10多万册。教堂的修缮、水电、琴、画以及笔墨、纸张的购置等项开支，主要来自教徒的奉献款。教徒群众中把全部生活归结为宗教生活的，搞宗教狂热的现象极少。他们大都是星期日到教堂里做礼拜，平常在家。劳动之余，晚饭之后，看看圣经，唱唱赞美歌。起床前、饭前、睡前，轻声祷告一会。当上教堂做礼拜在时间上与搞生产发生冲突时，该如何办？我曾经问一些教徒。他们说，这种冲突一般是不会发生的。宗教生活作为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他们是安排好了的，没有留活儿放到礼拜天去做。如果某一周比较忙，他们就加班加点，把活提前干完，星期天照常做礼拜。如果出现了要么耽误生产、要么不去做礼拜二者必居其一的情况，那就要看每个人信仰的虔诚程度。这次我在温州接触到的信教群众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家里有两个以上的人信教；第二种是家里只有一个人信教。在第一种情况下，上教堂做礼拜并不是全去，而是轮换着派代表；在第二种情况下，信教的这一家庭成员，或是提前把自己应干的活做完；或做完礼拜后回家多干点；或因不太虔诚不去做礼拜；或家庭其他成员多担当一点，因为她（他）到教堂祈求上帝保全家平安，也不是一件坏事。总之，是把生产放在第一位，把宗教生活摆在第二位。许多人还在生产、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

再就佛道教来说，僧尼道人修持与生产并重。如位于乐清县雁荡山的灵岩寺，有12名僧人，除念经拜佛外，还结合雁荡山是旅游胜地的特点，办起了旅馆、素斋馆、商店。1986年，该寺从事服务行业的收入为9千余元、佛事香火钱收入近8千元。他们把这些收入用于整修寺院、僧众生活和捐赠公益事业。又如，位于苍南县荪湖山上的燕巢洞，有道人17名，他们的生活由念经、练功和生产劳动三部分组成。他们的生产劳动有种菜、采种药材、植树造林等。再如，位于温州西部山区泰顺县境内的宝林寺、崇教寺和明山寺，现有常住僧尼54人，他们一边修持，一边生产，耕种水田28亩，旱地14亩，管理山林3354亩。1985年生产粮食4万余斤。此外，他们还开山造田、架设电线、创办茶叶初制场、购置碾米机和抽水机、架桥

铺路等等。再如平阳县万全区榆垌乡的瑞连寺，有三名尼姑，结合温州农村家庭工厂蓬勃发展的特点，办起了汽配厂，生产汽车备胎架、汽车灯开关。产品销售到北京、河南、湖北、浙江各地。质量可靠，没有退货现象。自1984年底到1986年11月，总产值计7千余元。

其次，存在着不协调的一面。就基督教的情况看，少部分人对中国基督教独立自主自办教会不理解或公开反对。他们自找地方搞宗教活动，他们使用的宗教书刊部分是从海外流传进来的，他们宣传有神无神不能同负一轭的言论，制造信教者和不信教者、信教群众与政府之间的隔阂与对立。

再就佛道教的情况看，温州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佛道教与封建迷信活动交织的状况并没有完全改观。一方面，信鬼神、封建迷信活动在温州群众中比较普遍，尤其是在农村。实际上，群众并没有把封建迷信活动和佛道教区分开。列祖列宗、财神爷、佛、包公、关帝、土地爷、玉皇大帝、观音、山神爷等等东西，他们都敬拜。一些农户，家里出现了所谓的不好兆头，如母鸡学公鸡叫、蛇挂梁、老鼠相拖尾、狗上屋等，便要去卜卦。若是凶卦，就要请人念经作法、消灾祛邪保平安；家里的老人或小孩生了病，也有请人念经做法的；老人祝寿，做延生道场；死了人，做超生道场。所有这些，都需要和尚、道士。另一方面，温州“文革”期间离开寺庙的僧人，现在是三种情况，（1）返回了寺庙宫观；（2）完全还了俗；（3）没有还俗但又没有返回寺庙宫观。第三种情况的，叫“自由和尚”、“自由道士”。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迎合并满足部分群众封建迷信活动需要。有人去请念经、做佛事、摆道场，他们欣然前往，完毕之后，收10元至50元人民币不等，群众称他们为“抓鬼专业户”。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封建迷信活动。

社会主义时期我国生产力的发展以至整个社会的前进，需要多方面的协调，宗教也不例外。从温州的实际情况来看，要使宗教与社会主义建设趋于协调，至少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宗教的表现形式要适应社会主义社会发生的一些变化，一是人民政府要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温州的佛道教的历史从现存的寺庙宫观遗迹能追溯到晋代。历史上，温州的佛道教与封建迷信活动有一定联系，一部分僧尼道人靠外出念经做道场生活。天主教和基督教是在19世纪中叶传入，前去传教的外籍神职教牧人员，有意大利的、法国的、波兰的，还有英国的和美国的。到解放前夕，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教徒数占当时温州人口的百分之四。英、美、意等国的神职教牧人员掌握着这两个教会的经济、人事和传教权。显然，解放后，即使人民政府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如果天主教和基督教的经济、人事以及传教权依然受外国宗教组织操纵，如果僧人道士依然是主要靠外出化缘生活，那么，宗教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协调就无从谈起。

“文革”期间，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被全盘否定，宗教职业者以至信教群众被当作“牛鬼蛇神”加以专政，一切宗教活动被强行禁止，宗教活动场所被拆毁或改作它用，但实际上，宗教信仰在信教群众心中依然存在，有的在在家里烧香拜佛，有的相约夜里到远处的山里做祷告。事实表明，宗教适应社会主义社会起了某些变化，但不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宗教和社会主义建设也难以协调。

作者工作单位：中共中央党校
责任编辑：谭深